

※文哲譯粹※

## 殖民地臺灣的下村湖人 ——文教官僚的挫折和教養小說作家的誕生

藤井省三\* 著 張季琳\*\* 譯

### 一、張季琳女士「臺灣意識」的覺醒

十五年前，我曾經為某文藝雜誌的「海外文學事情」專欄撰寫一篇隨筆〈「臺灣意識」與傳記研究〉<sup>1</sup>，簡單介紹《謝雪紅評傳》<sup>2</sup>、《陳逸松回想錄》<sup>3</sup>等書。當時大概是為了說明前衛出版社（臺北）新臺灣文庫評傳系列叢書風潮背後所存在的高昂「臺灣意識」，我在隨筆中寫了下列一段話：

中央研究院的年輕研究助理 C 女士，八〇年代後期，留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獲得碩士學位。任職中央研究院後，因優秀的日語能力受到賞識，而受託整理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人作家資料。她專注於工作的同時，對臺灣文學產生興趣，因而改變研究方向，以戰前作家楊逵（1906-1985）的東京留學經驗作為研究主題，撰寫博士論文。C 微笑著說：

---

本文譯自藤井省三：〈序：殖民地台灣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教官僚の挫折と教養小説作家の誕生〉，刊載於張季琳著：《台灣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教官僚から作家へ》（東京：東方書店，2009年3月），頁 i-viii。

\* 藤井省三，日本學術會議會員、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

\*\* 張季琳，本所副研究員。

<sup>1</sup> 藤井省三：〈台灣意識と伝記研究〉，《すばる》1995年4月號；本文亦刊載於《讀賣新聞》，1995年5月19日。中文版：〈臺灣近代史的證言——「臺灣意識」與傳記研究〉，收入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臺灣文學這一百年》（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8月），頁237-242。

<sup>2</sup>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年）。

<sup>3</sup> 陳逸松：《陳逸松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

「我的少年時期仍是國民黨高唱反攻大陸的時代。學校並不教導有關臺灣的事情，地理和歷史課都只教大陸的。直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中國東北有哪些特產呢。」<sup>4</sup>

這位 C 女士正是本書《下村湖人在臺灣——從文教官僚到作家》<sup>5</sup>的著者張季琳博士。之後，張女士再次到東京大學留學，經過五年熱心研究的成果，以戰前臺灣日語文學代表作家楊逵和日本普羅文學運動關係的劃時代研究，而獲得東京大學頒發博士學位。

將近代國家的國語制度帶入臺灣的，是自一八九五年以來，長達五十一年殖民統治的日本。初期雖有武力反抗，但一九四三年末，懂得日語者已接近島民的 60%，臺灣島民在全面性的語言同化的同時，日語成為全島共通的「國語」，因而跨越由各種方言、血緣、地緣所構成的各種的小型共同體意識，進而形成全臺灣的共同體意識。這或許可以說就是臺灣民族主義的萌芽。在這之前的一九三〇年代，日語讀書市場開始形成，臺灣人創作的日語文學也開始正規化，日語作家的作品不斷地刊載在內地的綜合雜誌、文藝雜誌，臺灣島內的文章雜誌也開始盛行。

張女士博士論文的焦點以普羅作家楊逵為主，廣泛涉獵各種文獻的同時，也對曾給予楊逵及其文學形成有過重大影響的日本人遺族和關係人士，進行大規模的訪談和問卷調查，進而釐清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下楊逵文學的形成過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考察楊逵就讀公學校（臺灣人學生就讀的小學）時代的恩師沼川定雄（1898-1994）的生涯，以及沼川定雄對楊逵文學的影響<sup>6</sup>。此外，張女士對於救濟因普羅文學運動衰退、中日戰爭爆發、夫妻雙雙病倒而受到重挫的楊逵，之後因「紅色警察」身分而自殺的日本警察入田春彥（1909-1938）的傳記研究<sup>7</sup>，也特別受到注目。

在此之前的楊逵研究，往往傾向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左翼作家等略顯單純的形式；相對於此，張女士則揭示了主要支撐殖民地統治的所謂帝國尖兵的教

<sup>4</sup>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臺灣文學這一百年》，頁 237。

<sup>5</sup> 張季琳：《台灣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教官僚から作家へ》，頁 270。

<sup>6</sup> 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臺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2 期（2003 年 3 月），頁 1-33。

<sup>7</sup> 張季琳：〈楊逵和沼川定雄——臺灣作家和公學校日本教師〉，《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4 期（2004 年 3 月），頁 155-182。

師和警察，竟幫助臺灣人普羅作家的這種歷史的弔詭，指出帝國主義統治下與臺灣民族主義萌芽之間的辯證關係，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

尤其，一九三七年，罹患肺結核和極度窮困中的楊達，因二十元的債務，被米店告上法院時，日本人警察入田春彥將相當於自己兩個月薪水的一百元無條件地贈送楊達。入田春彥其實是一位政治上的轉向者，翌年，入田自殺後，遺留給好友楊達一套改造社出版的《大魯迅全集》<sup>8</sup>，這套全七卷的藏書引領楊達親近魯迅文學的事實，令現代的日本人不禁有無限的感慨。

張女士的楊達研究獲得學界的高度肯定，二〇〇一年，榮獲日本臺灣學會的第一屆學會賞（獎），並回到臺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復職，順利升等為助研究員。

## 二、從普羅文學的楊達到教養小說的下村湖人

之後，張女士致力研究的題目是，下村湖人（1884-1955，本名下村虎六郎）殖民地臺灣經驗（1925-1931）的相關研究。事實上，楊達公學校時代的恩師沼川定雄一九二六年起，曾經在舊制的臺中一中擔任過五年的數學教師，那時臺中一中的校長是下村虎六郎，也就是日本戰敗後，在日本以教養小說作家贏得美名的下村湖人。張女士進行下村校長的相關研究時，驚訝地發現，在日本因《次郎物語》、《論語物語》等教養小說聞名，以作為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的教育家而為日本讀者所敬愛的下村湖人，相較於擔任校長時期作為民族差別主義者而被臺中一中畢業生所厭惡的下村虎六郎，日、臺間對下村的評價竟有極大的落差。

自一九二五年開始擔任臺中一中校長的三年半期間，下村因為處理臺灣學生引發的罷課事件，他的才能受到賞識，榮升為臺北高等學校教授，接著又升任校長，不久，再次遇到日本和臺灣學生所引發的罷課事件。其中由於臺中一中罷課事件可能發展為臺灣人的反殖民地運動，在總督府的命令下，下村不得不採用大批退學處分學生的強硬彈壓策略，因此被臺灣人學生所怨恨。張女士調查臺灣當地的新聞報導、臺灣總督府文書和臺中一中同學會誌等資料，以及原臺中一中學生的訪談紀錄，細心地爬梳了這兩次罷課事件的來龍去脈。

<sup>8</sup> 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義、井上紅梅等譯：《大魯迅全集》（東京：改造社，1937年）。

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後，年紀輕輕的下村在三十六歲就擔任過鹿島中學等學校的校長，在故鄉佐賀縣的中等學校教育界，是一位享有美譽的校長。但是，在臺灣嚴酷的殖民地體制的現實下，他經歷了個人理想逐漸崩潰的體驗。

在臺六年，辭去舊制高校的校長職務，回到日本的下村，脫離了精英文教官僚的晉升路線，立志成為以勞工青年為對象的社會教育家。一九三六年，為了對抗氣焰高漲的軍國主義，決意保護自由主義的下村，開始撰寫自傳小說《次郎物語》全套五部作品。撰寫期間，下村以個人理念為基礎，重新閱讀、重新改寫《論語》裏全人教育家孔子以及孔子和其弟子之間的師生愛，而於一九三八年出版了小說《論語物語》。

### 三、中國文學專家松枝茂夫和下村湖人的《論語物語》

《次郎物語》第一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從戰爭時期直到戰後一九五四年出版了《次郎物語》全套五部。從國會圖書館的典藏目錄可知，《次郎物語》的各種單行本、文庫本和名作全集等，共出版了一〇一種，甚至也有廣播、電視、電影等媒體化的作品。幾乎所有五十歲以上的日本人，只要聽到《次郎物語》，都不禁會感到懷念吧！即使現在，也可以買到波普拉 (poplar) 社文庫版的五冊《次郎物語》。

另一方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講談社刊行的《論語物語》，雖然是「作者本人最有自信的作品」，可惜「精心著作卻銷售不佳」（加藤義德）。戰前期銷售量不佳，大概是因為該書為了反抗中日戰爭的潮流，刻意將儒學的古典解讀為愛的全人教育的宿命。《論語物語》掀起沉靜的熱潮是戰後的事情了。從國會圖書館的典藏目錄中，可以檢索出《論語物語》十六件。不好意思，在此談起個人私事，一九六八年，我就讀高中一年級時，暑假作業之一就是閱讀《論語物語》，是一九六六年初版的角川文庫版。記得當時正值學園紛爭<sup>9</sup>時期的高中生的我，還因此特別反感呢！順便一提，為了撰寫張女士《下村湖人在臺灣——從文教官僚到作家》一書的序文，我在書店翻閱了睽違四十年的《論語物語》時，得知《論語物語》現在已經

<sup>9</sup> 譯註：學園紛爭，指1960年代後期，日本「東大門爭」、「全學共鬥會議」等以大學為主，進而影響全國高中及補習班的學生運動。

收入講談社的學術文庫中，一九八一年初版的文庫本，在二〇〇八年八月重複印刷至第四十八刷，《論語物語》已成為長期暢銷的書籍了。

然而買書後，我走近書店特賣中的舊文庫本的專櫃，突然有種莫名的悸動。仔細一看，書架的角落，竟夾藏著一本旺文社出版的文庫本《論語物語》，我拿起書，打開目錄一看，除了本篇序文前段所引用加藤義德的〈導讀〉，竟然還刊載著一篇松枝茂夫所寫的〈下村先生的回憶〉。

眾所周知，松枝茂夫(1905-1995)是翻譯過《紅樓夢》、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無數名作，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家、大翻譯家。旺文社出版《論語物語》文庫本的一九七六年，當時松枝茂夫是東京都立大學（現為首都大學東京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中文系的教授。根據〈下村先生的回憶〉敘述，一九二〇年，下村湖人到佐賀縣立舊制鹿島中學擔任校長時，松枝是該校三年級學生，松枝直至晚年都師事下村。松枝引用下村晚年著作《現代譯論語》(1954)「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一句話後，說：「對我而言，下村老師正是這樣的人士。」

就連《論語物語》一書，松枝也說：「〔該書〕如實地展現出老師的風貌。老師藉由《論語》表述自己的世界觀、倫理觀，表達出歷來沒有的個性鮮明的孔子形象。」松枝茂夫自舊制中學時代以來，持續四十年以上，一直對下村湖人懷抱著深厚的敬愛之情。

#### 四、從「虎人」成長為「湖人」及對於殖民地統治的謝罪

松枝茂夫記憶中的「湖人」相關軼聞，很有意思。他說：

《論語物語》出版時，我第一次得知老師以湖人為號的原因。我以為湖人就是虎人的意思，因而請問老師，老師回答：「我只是山中的湖而已。」

本名虎六郎的下村，在臺期間以「虎人」為筆名，回日本後，捨棄文教官僚晉升之路，改變為提倡愛的教育的作家時，將筆名從武斷的「虎人」更改為溫柔敦厚的「湖人」。關於更改筆名的詳細經過，張季琳女士《下村湖人在臺灣》書中有詳細考察。

根據張女士的考察，下村湖人生涯中幾乎不曾談過他的臺灣經驗。大概是從「虎人」改為「湖人」的背景中的臺灣經驗，對於理想主義者的教育家而言，太過苦澀，而作為帝國主義尖兵的殖民地經驗，對下村而言，更是一種無法向中國文學

專家的得意門生述說的記憶吧！

從帝國首都東京到故鄉佐賀，從殖民地臺灣的臺中到臺北，然後輾轉再到東京各地的下村，或許因此而對春秋亂世中周遊列國，闡述治國理想的孔子，有深刻的共鳴吧！《論語物語・孔子與葉公章》，孔子遊訪葉國，當葉公向其炫耀嚴刑峻法的法治主義成果時，孔子回答：

所謂真正的正直，是指能夠保護培育人類相互的愛。即使法律也並不因其是法律而就是正直，只有讓人與人之間盡量充滿了愛，才是真正的正直。這件事請您絕對不要忘記。

當然不說也知道，這是下村取材自《論語・子路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的典故而「編寫的小故事」（《論語物語・序文》）。

吉川幸次郎解釋《論語》原典的這一段話說：「應該著重國家共同利益，或應該著重家庭內的愛情呢？中國自古就有所論爭，站在前者立場的就是法家，站在後者立場的就是儒家。」<sup>10</sup>然而，下村自己在《論語物語・序文》中寫道：「著者並不是要描寫歷史人物的心，只是要描寫著者本人以及著者周圍的人的『心』而已。」希望將「家庭內的愛情」推廣為更普遍的「充滿著愛」的人類關係。但是，這樣的理想在殖民地臺灣卻是無法實現的夢……。

我剛才寫過下村的臺灣體驗是「作為帝國主義尖兵的痛苦不堪的殖民地體驗」，然而，下村又是如何思考殖民地統治下臺灣人學生的心情呢？如何省思成為「帝國主義尖兵」的自己，在與臺灣人民接觸時的人道上的過失呢？《論語物語・子路問津章》，對於毫不留念濁世而「放吟山野，與鳥獸為友」的隱士，下村讓孔子說出：「儘可能和人類共同受苦，是我由衷的願望，如此，我才有喜悅，才能安心。」很難想像寫出這一段話的下村，對於殖民地體制下臺灣人民的苦痛，果真毫不關心嗎？

根據張女士在本書中所引用下村的女兒的回憶，下村湖人「對家裏的雇傭」、「專屬的車伕夫妻、小販等不使用命令式語言或差別待遇。都盡可能地表現親切」。然而，在戰前帝國主義體制下的日本，去揭發殖民地統治的人道上的過失，對教育家下村似乎負擔過重，據說他對自己的家人也從來不談及臺灣時期的回憶。

<sup>10</sup> 吉川幸次郎：《論語（上）》（東京：朝日新聞社，1996年朝日選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日本帝國因戰敗而滅亡了，日本在美軍占領下，度過了七年。日本戰敗這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下村寫了一封信給他在臺灣時期的日本人好友，當時的總督府文教局長：「如您所言，只要想起臺灣的事情，就感到淒涼空虛。理由既不是因為『徒勞的生活』，也不是來自所謂『國家』的立場，而是撼動全身的莫名空虛感。我想藉這個機會，由衷地向臺灣和臺灣人致歉。每次翻閱通訊錄，看到臺灣人士的名字，就特別感傷。」這時候的下村終於能夠真正成為和《論語物語》主角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我認為下村虎六郎花了大半輩子的歲月才成長為下村湖人，而臺灣經驗正是他人生最重大的考驗。

本書敘述大日本帝國的精英文教官僚受挫於殖民地教育，轉向社會教育運動，持續書寫自傳性小說《次郎物語》、《論語物語》，在帝國崩潰後，終於成熟轉型為社會教育家、教養小說家的過程。然而，我們現代日本人從現代臺灣人張季琳女士對於下村校長在帝國主義下臺灣的言行，時而嚴厲，時而溫暖的視線中，應該可以理解到什麼呢？

譯後記：本文翻譯期間承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戴璉璋教授賜予意見，謹此致謝。